

# Kra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f Our Time

科目：公共行政理論

報告人：王銘岳

日期：2006/11/10

---

Polanyi的企圖，是試圖探討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書中最主要的論點是認為政治（政府）和經濟是不可分割的。並且一個社會之所以存續，仰賴一個經濟臣服於民主社會的價值。市場的自然機制，必須建立在民主政治之下，並且，對於私有財產的追求必須臣服於社會網絡，而不單只是個人的自由。個人自由、人類的自然意志，是允許人在某種程度上，願意在管理上花費所有可能的成本，做出不理性的決定。於是Polanyi反駁古典經濟學中，認為社會圍繞著如同烏托邦般，自律性（Self-regulated）市場而建立的說法。他認為這樣的經濟會摧毀人類的社會性。這樣極端自我調節機制的市場未能出現的原因，是因為傳統社會中，人類是使用人性來衡量與保護自己

。於是Polanyi首先認為經濟需要有相當社會性的組織存在才得以延續。並且延續第一點，他駁斥自由主義認為經濟和社會、政治可以切分為不同領域的說法。他認為政治對經濟進行管制，才能夠讓社會得以完整。

Polanyi的案例，使用三個原則來攻擊古典經濟學 1)  
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人類競逐利益的動機；土地、勞工、與資本 --  
他所稱呼的「虛幻的商品」（fiction of the commodities）--  
在古典經濟學中的地位 2) 他仔細描述市場經濟與自律性市場機制的分別 3)  
自律性市場機制的內涵與社會行動之間，為何在十九世紀歐洲具有本質上的矛盾。十九世紀的歐洲和平，是建立在一百年中強權彼此權力微妙均衡的結果。政治是被設計用來保護自由市場經濟，於是Polanyi認為恰好是這種均衡的矛盾促使社會的基礎逐步被摧毀。要了解那時的經濟體制，必須要了解政治力量被設計來保護什麼。

Polanyi首先攻擊古典經濟學對於個人會自然地競逐利益的說法。他認為競逐商品的動力來自於社會透過政治力量改變社會的組成結構，以建立市場系統。也就是說工商業的發展讓商人從以往買賣真實物品，變成購買勞工和原料進行生產，然後再將產品賣出。這樣的改變指涉了動機的改變：從生存的動機變成追逐利益的動機。Polanyi描繪人類的經濟隱含在他的社會關係之中：尋求安定、社會地位、社會資本，而非單純只是自我利益。即使是必需品的競逐，也無法改變人會尋求在社會中生存的主要動機。無論是在傳統的小村落社會，或是極權社會中。

Polanyi進一步對於生產的三個主要要素：土地、勞工與資本進行論述。市場經濟將這三者單純視為必需品。但Polanyi將這三者視為「虛幻的商品」，因為這三者不是用來「生產進行販賣」，而是生產的工具。因此，社會會組織相應的力量來保障這三者不受政治的干擾，以避免風險和保障資本投資。

一個自律性的市場，事實上是一種經濟至上的說法，將社會、政治與經濟完全切分為不同部份。Polanyi認為不管是部落社會、封建社會、重商社會都不曾出現這樣的市場，更不可能會在資本主義中出現。他認為自由放任需要有三個條件：勞工可以在市場中找到他自己的價格；資本的創造來自於商人；貨品可以在不同國家間自由流動。而事實上，這樣的自由放任對於生產方面，而非交易方面。唯有國家進行管制，去監控市場，才能確保市場是「自由」的。既使如邊沁這樣極度強調個人自由的主張，講到市場時都認為「知識」與「權力」是市場能成功運作的兩個條件，而由國家管制的成本比起透過每個個人來說低廉很多。

Polanyi進一步認為社會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純粹經濟利益所侵害，政府會允許不同團體、不同階級組成不同的聯盟。但他不接受馬克思的想法，認為階級之間必然是對立鬥爭，而認為階級之間除了經濟利益之外，還會追求社會地位與安全感。於是階級之間往往會追逐一致性的社會利益。例如勞工取得普選權後，透過選票形成政治力量，制定有關最低工時、工作保障的法律。在此之前，並未有一個勞工市場。勞工市場是透過這種方式建立起來的。雖然自由主義視民選政府為資本主義的最大敵人，但這種看法無異是殺雞取卵。因為大多數人並未因為物質利益增加而獲利。Polanyi認為，這是十九世紀歐洲市場體系之所以崩潰的原因。

十九世紀末的歐洲社會，主要圍繞著四個制度所組成：強權間的權力均衡、金本位制、自律性的市場機制所創造出的龐大利益，以及自由主義國家。金本位制的基礎，是將不同國家間經濟實力作為市場的保證，這當然仰賴小心翼翼維護的權力均衡。對於製造商而言，價格的波動會侵蝕他們的利潤，因此他們希望價格穩定，也就是匯率要穩定。但是資本市場天性就不是穩定的，所以必須要有一個衡量不同市場間的機制來穩定價格。也就是最終必須要在「貴金屬貨幣」（黃金）與「代幣」（貨幣）之間找到一個解決方式。而這樣的方式，就是建立中央銀行體系：由官僚進行干預。經濟學家視貨幣為交換的工具，但從政者卻將貨幣視為選民購買政治力量的工具。於是，貨幣政策就有兩個主要的地位：變成經濟衝突的焦點；在國際上，主宰國際政治，變成自由主義國家要轉變成國家主義國家時的最主要問題。如果政府建立政治的認同，則中央銀行就建立起經濟的認同。但是，銀行（中央）政策，卻是一個政治議題。Polanyi認為，市場經濟已經改變了社會結構，但自我調節的市場卻從未了解到這一點：因為社會會保護他們自己，甚至保護自己不要重組。

Polanyi以社會改革者所制定的固定農產品價格為例。他們極力阻擋市場自然調節機制，於是最後問題就不只是保護主義、國內國外、社會國家，而是變成農產品與工業產品的關稅問題。於是，穩定匯率就成為自俾斯麥開始的國家主義最主要的優先考量。但因為國際信用市場是高度政治性的，貸款給予與否，還有償還時間都由政治決定，而非貿易。於是在1920~1930年代，穩定匯率在通貨緊縮與大蕭條的狀態下無以為繼時，存在在工人與雇主階級的矛盾就產生了：工人要政府迫使生產者提供更多福利，形成社會、經濟與政治上的死結，於是金本位制不得不被放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要讓金本位制能夠順利運作，需要強而有力的政府抵抗「自由市場的價格」。這樣的要求促成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對抗民選政府。法西斯主義的解決方式，不是回到自由市場，而是透過重組經濟（產業）、政治的形式來重塑一個新的市場經濟。Polanyi指出，當重新檢閱法西斯、社會主義（蘇聯）與新政的案例，可以發現他們並非要消除市場，而是要消除「自律性」的「自由放任」市場。土地、勞工與資本並非直接由市場決定其價格，而是透過國家，由社會來決定。

Polanyi的主要論點，就是政治和經濟是不可分割的。在他的論點底下，官僚和行政是最主要保證穩定，以及維持適度控制和干預來維繫政治經濟關係的主要工具。換句話說，國家的角色，是緩和轉變時產生的巨大問題，以讓社會達成一個新的狀況。根據Polanyi的觀點，改變的時刻往往造成人類生存條件的轉變，此時如果讓市場力量主宰一切，那無異是人類整體在自殺。